

黎虎 著

汉代外交体制研究

(下册)



013-10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黎虎 著

汉代外交体制研究

(下册)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4年·北京

下册目录

第五章 外交通意工具·····	685
第一节 译·····	685
一、译在外交中的作用·····	686
(一)口译·····	687
(二)笔译·····	689
二、译事机构与官员·····	694
(一)译事机构的设置·····	695
(二)译官之奉命出使·····	699
第二节 文书·····	703
一、外交文书类别·····	704
(一)对等性文书·····	704
(二)非对等性文书·····	709
二、外交文书与内部文书关系及其特点·····	715
三、其他外交文书·····	721
(一)檄书·····	722
(二)“簿责”·····	724
四、外交文书的生成和传递·····	725
(一)外交文书的决策·····	725
(二)外交文书的撰写·····	728

(三) 外交文书的形制	733
(四) 外交文书的传递	734
(五) 文书接受及其礼仪	741
五、文书在外交中的作用与地位	742
(一) 谈判	742
(二) 晓谕	745
(三) 责让	746
(四) 谢	748
(五) 求请	749
(六) 通报	758
(七) 宣示	760
(八) 礼仪	762
(九) 争竞、角逐	763
第六章 外交接待设施	766
第一节 驿置	766
一、驿置的管理	767
二、驿置在外交中的作用	772
(一) 接待来使	772
(二) 接待送使	774
(三) 接待出使	776
(四) 接待和亲公主及和亲使	778
(五) 传递外交文书	781
第二节 馆舍	785
一、先秦时期的交聘馆舍	786
(一) 西周时期的“庙”、“寝”馆舍制度	786
(二) 春秋时期的“诸侯之馆”	789

(三) 战国时期的“诸国之邸”	793
二、汉代的“蛮夷邸”	795
第七章 外交礼仪与法纪	804
第一节 外交礼仪	804
一、外交礼仪中的大典——朝礼	806
(一) 承前启后的叔孙通朝礼	807
(二) 朝礼的会务官员	819
(三) 朝礼外交功能的发展	871
(四) 西汉后期朝礼的重大突破	874
(五) 东汉时期朝礼的发展与扩张	883
二、外交接待礼仪	907
(一) 迎送礼	908
(二) 款待礼	945
三、外交礼仪的基本原则、精神和特点	985
(一) 对等、平衡与非对等、平衡	987
(二) 报答与报复	993
(三) 外交特权与特权之侵犯	1018
第二节 外交法纪	1040
一、国际惯例和国际法	1041
(一) 国家的承认、领土与疆界	1043
(二) 条约	1051
(三) 涉外犯罪	1079
二、外事法纪	1082
(一) 赏功	1083
(二) 罚罪	1094
(三) 外事赏罚的特点	1118

跋语	1129
一、“人性”、“国性”与汉代外交	1130
(一)利欲“本性”的发挥	1131
(二)好奇心“本性”的发挥	1133
(三)想象力“本性”的发挥	1135
二、“软实力”与汉代外交	1137
(一)“德”——中国古代外交“软实力”核心	1137
(二)汉代外交软实力作用之类型	1149
附录:中国古代外交史研究若干概念辨析	1167
参考文献	1185
后记	1197

第五章 外交通意工具

外交双方的联系,离不开彼此意旨的沟通,沟通的手段和工具不外口头的、文字的两个方面,但是由于外交工作的特殊性,其语言和文字的沟通均离不开“译”,此为其与一般社会人群之间的沟通有所不同之处。又由于外交对象的特殊性,故其文书与一般社会文书相较亦自有其特点。“译”与“文书”为外交通意^①之主要工具。

第一节 译

译是外交关系发展中首要之通意工具和手段之一。外交之对象为四方国、族,而四方国、族语言各异,文化有别,故需通过“译”进行沟通。“译,传四夷之语者。”^②古人对“译”之所起及其功用早有认

^① “通意”一词古已有之,战国时期已行用,《墨子》:“通意后对”,张云:“先通彼意,后乃对之。”(《墨子间诂》卷十《经下第四十一》)《淮南子》卷六《览冥训》:“昔雍门子以哭见于孟尝君,已而陈辞通意,抚心发声,孟尝君为之增欷歔,流涕狼戾不可止。”汉初,吴楚七国谋反,“及发,齐、济北两国城守不行。汉既破吴,齐王自杀,不得立嗣。济北王亦欲自杀,幸全其妻子。齐人公孙瓊谓济北王曰:‘臣请试为大王明说梁王,通意天子,说而不用,死未晚也。’公孙瓊遂见梁王……”(《汉书》卷五十一《贾邹枚路传》)东汉末年,曹操“北拒袁绍,时远近无不私遗笈记,通意于(袁)绍者。”(《三国志》卷二十三《魏书》二十三《和常杨杜赵裴传第二十三》注引《魏略》)举凡以语言或文字陈述彼此意旨,以达到沟通目的均属“通意”。

^② 《说文解字注》,第101页。

识,《礼记·王制》曰:“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四方国、族不仅生活条件和习性有所差异,语言亦各不相同,“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认为古代以“寄”、“象”、“狄鞮”、“译”等不同方式以沟通四夷语言,郑玄说这些名称“皆俗间之名,依其事类耳。”孔颖达分别解释其义,“寄,言传寄外内言语。”“象者,言放象外内之言。”“狄鞮者,鞮,知也,谓通传夷狄之语,与中国相知。”“译,陈也,谓陈说外内之言。”^①可见在古代“传四夷之语者”有多种多样称呼,及至汉代已基本上统一谓之“译”^②。

一、译在外交中的作用

四方国、族外交关系之进行和发展,端赖于言语与文字以进行沟通,而两者均离不开“译”。汉王朝统一帝国的建立,推动了外交关系之空前发展,“译”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太史公曰:“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③汉武帝即位后,更大大向前推进,“康居西域,重译请朝,稽首来享。”^④“百蛮之君,靡不乡风,

① 《礼记正义》卷十二《王制》,第1338页。

② “译”的内涵有二,一为言语与文字之翻译,二为掌握翻译技能的译者。前者为通意工具,后者如参与外交工作,则为外交人员或官员。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在这里将两者置于一节之中;译者之外交人员或官员的作用,我们在以上各章节涉及之处已经随时作了论述。

③ 《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第3299页。

④ 《史记》卷一百一十七《司马相如列传》,第3044页。

承流称意。远方殊俗，重译而朝，泽及方外。”^①东汉中兴之后，承其余绪，“若夫文身鼻狄缓耳之主，椎结左衽鏹鍬之君，东南殊俗不羁之国，西北绝域难制之邻，靡不重译纳贡，请为藩臣。”^②“其条支、安息诸国至于海濒四万里外，皆重译贡献。”^③这些记载反映了两汉时期外交关系之空前发展，四方国、族纷至沓来，或来朝或来献，但是这些外交活动均离不开“译”，而且有的需要经过“重译”方才得以进行。“重译，更译其言也。”^④即由甲语译为乙语，再由乙语译为丙语……经多重翻译方能相通。故“重译”又谓之“累译”^⑤或“九译”^⑥，均言其多也，表明四方国、族所来之遥远。相传“交阯之南有越裳国。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译而献白雉，曰：‘道路悠远，山川岨深，音使不通，故重译而朝。’”^⑦汉代人视越裳重译来朝为国家强盛之重要标志，故常以之比附汉代外交关系之盛况。

“译”被运用于外交关系之各个方面和场合，约而言之，其功用大略为二：一为口译，一为笔译。

（一）口译

口译是外交场合中运用最为广泛和普遍的一种方式。四方国、族来朝时，汉方需配备译者以承担宾主之间交谈之中介。西汉哀帝元寿二年（前1），“匈奴单于来朝，宴见，群臣在前。”当时哀帝的宠臣董贤也参加了这次非正式的会见，“单于怪（董）贤年少，以问译。上令

① 《史记》卷六十《三王世家》，第2109页。

② 《后汉书》卷八十上《文苑传上》，第2607页。

③ 《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第2910页。

④ 《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第3300页。

⑤ 《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传》论，第2860页。

⑥ 《后汉书》卷六十上《马融传上》，第1967页。

⑦ 《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传》，第2835页。

译报曰：‘大司马年少，以大贤居位。’单于乃起拜，贺汉得贤臣。”^①这里的译者即为汉方为接待匈奴单于来朝而配备的。单于先向译者发问，由译者转告皇帝，皇帝再让译者转告单于。译者是皇帝和匈奴单于交谈的中介——口译人员。

汉方使者出使四方国、族时，所在国、族亦配备译者以承担口译任务。汉昭帝元凤四年（前77）傅介子出使西域楼兰，其目的是刺杀楼兰王，因楼兰王亲匈奴，经常勾结匈奴杀害汉使。傅介子“与士卒俱赍金币，扬言以赐外国为名。至楼兰，楼兰王意不亲介子，介子阳引去，至其西界，使译谓曰：‘汉使者持黄金锦绣行赐诸国，王不来受，我去之西国矣。’即出金币以示译。译还报王，王贪汉物，来见使者。”^②于是楼兰王中计被杀。这里的“译”，为楼兰国之译者，乃楼兰国为汉使所配置之译员。傅介子已经离开楼兰都城而至其西界，何以还有楼兰国译者跟随汉使呢？原来当时制度，来使离开时，一般均派遣引路者和译者护送，武帝元朔三年（前126）张骞出使至大宛时，大宛“遣（张）骞，为发译道，抵康居。”^③这里的“道”即“导”，“导者，引路之人；译者，传言之人也。”^④故楼兰国亦有译者参与护送汉使。则此译者不仅汉使在都城时担任口译，同时亦参与护送来使之责。

汉使亦可能自带译者。王莽始建国元年（9）派遣王骏等六人出使匈奴，更换汉朝所授印绶以新莽印绶。“单于再拜受诏。译前，欲解取故印绶，单于举掖授之。”^⑤此即王莽使团中之译者。东汉建武二十六年（50），“遣中郎将段郴、副校尉王郁使南单于，立其庭，去五原

① 《汉书》卷九十三《佞幸·董贤传》，第3737页。

② 《汉书》卷七十《傅介子传》，第3002页。

③ 《汉书》卷六十一《张骞传》，第2688页。

④ 《资治通鉴》卷十八《汉纪十》武帝元朔三年（前126）胡注，第611页。

⑤ 《汉书》卷九十四下《匈奴传下》，第3820—3821页。

西部塞八十里。单于乃延迎使者。使者曰：‘单于当伏拜受诏。’单于顾望有顷，乃伏称臣。拜讫，令译晓使者曰：‘单于新立，诚惭于左右，愿使者众中无相屈折也。’骨都侯等见，皆泣下。”^①这位译者亦当为汉使所带而担任口译之成员。

(二) 笔译

笔译亦为外交中经常运用之一方式，各种外交文书均需通过翻译方能达意。

文书往还是外交关系中一个重要的方式。汉匈之间的外交文书不仅终两汉而不绝，为汉代四方国、族中与汉方文书往还最多、最为频密者，这些文书无疑都是需要通过笔译的。而且从现在仍然保存下来的匈奴方面致汉方的文书观之，其文笔完全属于规范的汉文，则其译者必为精通汉语文者。

西汉宣帝时，匈奴遣使来汉，涉及匈奴单于是否来朝的问题，“中书谒者令宣持单于使者语，视诸将军、中朝二千石。（杨）恠曰：‘冒顿单于得汉美食好物，谓之殍恶，单于不来明甚。’”^②朝廷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一位叫宣的中书谒者令，将“单于使者语”拿到会场给内朝决策核心的诸将军和中朝二千石们观看。颜师古注“单于使者语”说：“谓译者所录也”。可知中书谒者令所持的是经翻译成汉语的匈奴使者的口述记录。这个记载透露了一个外交制度方面的信息：汉方接待来使，有关官员在听取来使的陈述时，需由译者做笔录，并将此谈话记录保存于有关部门或官员手中，以为决策及回应对方之依据。参

^① 《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传》，第2943页。

^② 《汉书》卷六十六《杨敞传》附《杨恠传》，第2891页。

加此次会议的“诸吏光禄勋”^①杨恽亦属内朝官员，他根据以往冒顿单于把汉王朝赐给的美食好物称为“殍恶”，判断单于不会来朝。这个资料表明，中央政府中有匈奴语译员，负责将匈奴语翻译并书写为汉文。

东汉时，益州西部“自汶山以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槃木、唐菟等百余国，户百三十余万，口六百万以上，举种奉贡，称为臣仆。”明帝永平年间，益州刺史梁国朱辅，“好立功名，慷慨有大略。在州数岁，宣示汉德，威怀远夷。”当时“白狼王唐菟等慕化归义，作诗三章”来献。由于“远夷之语，辞意难正。草木异种，鸟兽殊类。”以该族词语所作这种诗歌，不经过翻译不可能理解，于是朱辅组织相关人员对该诗进行翻译，“有犍为郡掾田恭与之习狎，颇晓其言”，益州所辖犍为郡郡掾田恭与该族人多有交往并相熟悉，通晓其语言，朱辅遂令田恭“讯其风俗，译其辞语。”将其翻译为汉文，然后“遣从事史李陵与（田）恭护送诣阙，并上其乐诗。”明帝“嘉之，事下史官，录其歌焉。”^②此即著名之《白狼王歌》。《东观汉纪》记载了此三诗的夷、汉文对照全文，分别题为《远夷乐德歌诗》、《远夷慕德歌诗》、《远夷怀德歌诗》^③。这个记载表明，周边地方政府也可能将异国、族之来书文字或来使所述翻译并书写为汉文，以上报朝廷。此虽非外交文书，但从中可见边郡处理外交文书翻译做法。

值得注意的是，与汉王朝发生外交关系、并有文书往来的四方国、族，大多数是没有自己的文字的，而他们致汉方的文书却都是以汉文书写的。那么他们致汉的文书是由什么人将其翻译成汉文？汉方致

^① 《汉书》卷六十六《杨敞传》附《杨恽传》，第2890页。

^② 《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传》，第2854—2855页。

^③ 《东观汉纪校注》卷二十《笮都夷》，第855—856页。《东观汉纪》“朱辅”作“朱酺”。

他们的文书又是由什么人翻译成该族语言的？上面我们谈到益州西部的白狼王曾经以本族语言所作诗歌奉献汉王朝，白狼属于羌族的一支，而羌族是没有文字的，显然这是以其本族语言而作成的诗歌，它是由益州犍为郡吏田恭翻译成汉语并以汉文书写而成的。

在四方国、族中与汉王朝文书往还最为频繁的首推匈奴，而匈奴恰恰也是没有本民族文字的，史称其“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①故匈奴的行政不以文书为用，而以口语进行，例如其司法即以其贵族呼衍氏、兰氏、须卜氏负责，“呼衍氏为左，兰氏、须卜氏为右，主断狱听讼。”他们司法的方式是：“当决轻重，口白单于，无文书簿领焉。”^②采取口头方式进行判决和上呈下达。这应当就是匈奴内部行政运作的基本程序。

那么，匈奴致汉之文书是由什么人所写并翻译成汉文？汉方致匈奴文书又是由什么人翻译成匈奴语？匈奴致汉之文书当基本上是由汉族人所翻译和书写的。其中，投奔匈奴之汉人应当是重要成分。匈奴老上稽粥单于初立，汉文帝复遣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阏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说傅公主。（中行）说不欲行，汉强使之。（中行）说曰：‘必我行也，为汉患者。’中行说既至，因降单于，单于甚亲幸之。”中行说投降匈奴后，“教单于左右疏记，以计课其人众畜物。”这种“疏记”是登记人口、牲畜和其他物资的账簿，其中除了数字之外，还应当有一些必要的汉字。他不仅将汉文输入匈奴，而且直接参与外交文书撰写：“汉遗单于书，以尺一牍，辞曰‘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所以遗物及言语云云。中行说令单于以尺二寸牍，及印封皆令广长大，倨警其辞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敬问汉皇帝无恙’，所以

① 《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第2879页。

② 《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传》，第2945页。

遗物言语亦云云。”^①他将汉王朝的文书制度带到匈奴,并据此而教唆匈奴如何在文书方面凌轹汉方,这种“倨犇其辞”的致汉方文书应当就是出自中行说之类人员之手。

汉匈之间长期的、激烈的斗争中,各自向对方投奔之人员数量不少而且相继不绝。汉文帝后二年(前162)致匈奴老上单于书中提出,双方“俱去前事:朕释逃虏民,单于毋言章尼等。”^②颜师古注前者曰:“谓汉人逃入匈奴者,令不追。”注后者曰:“背单于降汉者。”意即双方均不再追究逃亡对方之人员,由此可见双方互相逃亡对方的人员是不少的。前者将汉文化带入匈奴自不待言,后者来到汉地之后,学习汉的语言文字,接受了汉文化,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前者如逃亡匈奴的卫律,其父亲是长水胡人,他本人生长汉地。他可能是一位既通汉语又通匈奴语的人。他与协律都尉李延年相友善,经李延年推荐而出使匈奴。当他从匈奴出使回来,恰好李延年犯事被抄家,卫律“惧并诛,亡还降匈奴。”他投降匈奴后,“匈奴爱之,常在单于左右。”^③成为匈奴统治核心成员,为其出谋划策,甚得信任。卫律这类逃亡者有可能参与文书的翻译,同时对于传播汉语言文字亦有一定作用。后者如先投降汉方,后又返回匈奴的赵信。赵信原为“胡小王”,汉武帝元光四年(前131)“以匈奴相国降”^④汉,“汉封为翁侯”,元朔六年(前123)为大将军卫青所指挥的六将军之一前将军,出定襄数百里击匈奴,“前将军翁侯赵信兵不利,降匈奴。”赵信投降匈奴后,得到匈奴单于的信任和重用,“单于既得翁侯,以为自次王,用其姊妻之,与谋

① 《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第2898、2899页。

② 《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上》,第3763页。

③ 《汉书》卷五十四《李广苏建传》,第2457页。

④ 《汉书》卷十七《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第642页。

汉。”^①颜师古注曰：“自次者，尊重次于单于。”可见匈奴单于对他的重视，他也尽力为单于出谋划策。赵信在汉八年，对于汉语当有一定了解。

因此，服务于匈奴政权中的汉人不在少数。东汉建武二十三年（47）匈奴右翼鞬日逐王比因不得立为单于而怀恨，乃“密遣汉人郭衡奉匈奴地图”^②诣西河太守求内附。安帝永初三年（109）夏，“汉人韩琮随南单于入朝，既还，说南单于云：‘关东水潦，人民饥饿死尽，可击也。’单于信其言，遂起兵反畔，攻中郎将耿种于美稷。”^③郭衡担任匈奴方面的密使，而且带着匈奴地图，这种地图应当有文字以标注地名；韩琮则为匈奴单于入朝使团之成员，不仅参与机密，而且同时担任单于译者的角色也是可能的。

除此之外，汉方公主和亲匈奴，也带去庞大的随侍使团，于汉语言文字之输入亦有一定作用。匈奴侍子长期生活于汉廷，也应当掌握一定的汉语言文字，必有助于汉语言文字在匈奴地区的传播和运用。

到了东汉时期，随着匈奴与汉关系的更为密切，匈奴直接掌握汉语言文字的人亦有所增加。东汉建立后，儒学和学校教育有了较大发展，汉明帝时“复为功臣子孙、四姓末属别立校舍，搜选高能以受其业，自期门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经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学。济济乎，洋洋乎，盛于永平矣！”^④匈奴方面也派遣贵族子弟来汉留学，直接学习汉文化。例如南匈奴湖邪尸逐侯鞬单于就曾“遣伊秩訾王大车且渠来入就学。”^⑤这个时期匈奴方面有了通晓汉语文的本族人员，则这个

① 《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第2907—2908页。

② 《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传》，第2942页。

③ 《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传》，第2957页。

④ 《后汉书》卷七十九上《儒林传上》，第2546页。

⑤ 《后汉书》卷三十二《樊准传》，第1126页。

时期的致汉文书,由匈奴本族人员撰写、翻译的条件应当已经具备。

综上所述,我们大致可以作出如下一些体认:①匈奴方面致汉方的文书,是由单于等人口授、以汉文书写的。因为匈奴没有本族的文字,只能以汉文书写。也就是说这些文书在送出之前已经从口语翻译成汉文书了。②匈奴方面致汉方的文书,是在送达汉方之前已经书写完毕的规范形制。因为匈奴致汉方文书大多是通过使者递交的,如汉文帝前六年(前174)匈奴冒顿单于致汉文帝书是匈奴方面“使郎中系雩浅奉书”^①,汉文帝复匈奴老上单于书中亦谓其“使郎中系雩浅遗书”^②云云。可见这种文书不是由匈奴郎中系雩浅到达汉方之后口述而由汉方翻译的,而是事先已经制作完毕的,而与上述未带文书而由使者口述的翻译程序不同。③西汉时期匈奴方面致汉文书,基本上是在匈奴的汉人所书写、翻译的;到了东汉时期匈奴培养了自己的通晓汉语文的人才之后,由其本族人撰写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由此可见,外交文书的往还及其翻译过程,就是与四方国、族进行文化交流的过程,而汉文化处于这种交流的主导地位,因此这一过程可以视为是汉文化的传播、扩展过程。

二、译事机构与官员

汉代由于外交关系的空前发展以及译在其中具有特殊的作用而且运用频繁,因此译事机构与官员亦随之应运而发展,以满足译事管理和翻译工作的需求。这是汉代外交关系发展的需要,也是外交关

① 《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第2896页。

② 《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第2897页。

系发展的一个反映。

(一) 译事机构的设置

译事机构的设置是汉代译事发展的集中体现。

据说周代已经有了译事机构与官员的设置,秋官司寇属官有“象胥”,其职“掌蛮、夷、闽、貉、戎、狄之国使,掌传王之言而谕说焉,以和亲之。”^①负责接待四方国、族来使,其核心职务为“传王之言”,即担任翻译工作。故郑司农云:“象胥,译官也。”^②当时对于翻译四方国、族语言一事有多种称谓,“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③分别以这些不同名称来指称负责接待不同方面来聘国、族之译事官员,而将他们以“象胥”总称之,何以然?因为“周之德先致南方也”^④,具体来说就是“周始有越重译而来献,是因通言语之官为象胥云。”^⑤周代首先与南方的越裳氏发生外交关系,而以“象”负责接待他们,故将译者统称为“象胥”。

春秋时期“象胥”又被称为“舌人”。周定王在向晋使随会介绍周王室之礼时,谈到接待戎狄时“故坐诸门外,而使舌人体委与之。”^⑥韦昭注曰:“舌人,能达异方之志,象胥之官。”

到了汉代,译事机构在秦制基础上得到发展,主要有如下:

1. 中央外交管理部门中的译事机构

这种译事机构在中央政府两个负责外交管理的部门均有设置:一

① 《周礼注疏》卷三十八《秋官司寇·象胥》,第899页。

② 《周礼注疏》卷三十七《秋官司寇·大行人》郑玄注引,第892页。

③ 《礼记正义》卷十二《王制》,第1338页。

④ 《周礼注疏》卷三十四《秋官司寇》郑注,第869页。

⑤ 《周礼注疏》卷三十七《秋官司寇·大行人》郑注,第892页。

⑥ 《国语集解》,《周语中》,第58页。